

外国文学资料

(内部刊物)

15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四月

城市游击中心”论的破产

——简评《图帕马罗游击队》

《图帕马罗游击队》是乌拉圭新闻记者玛利亚·埃斯特尔·希里奥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品通过报道乌拉圭的城市游击战，宣扬已经破产的“游击中心”论。因此，当此书于一九七〇年出版后，就立即获得了古巴对外联络机构“美洲之家”的报告文学奖，并被吹捧为“一本具有直接材料性的文献。它强烈而生动地描写了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和理想，提供了在乌拉圭产生这场当代历史上最正义最英勇的游击战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

一九五九年一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巴蒂斯塔的武装斗争在古巴胜利之后，格瓦拉把古巴这次革命经验总结为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理论——“游击中心”论。这个理论由格瓦拉创始，经法国作家德布雷整理完善，形成完整的体系。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歪曲。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已经过时，在拉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须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它认为它所要进行的游击战，不需要发动和依靠工农基本群众，只要少数“先驱者”去到荒无人烟的丛林地区组成游击队，采取对政府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就能推翻反动政府取得“革命”胜利。它认为在它的游击队里，不需要政治工作，亦不需要民主，一切以指挥员的意志为转移；战士的士气和纪律，依靠对首长的忠诚和对荣誉的追求即可维持。它认为这种“游击战”适用于拉美各国，无须对各国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它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拉美都不适用；认为毛主席的军事学说，特别是人民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拉美革命中是有害无益的。

“游击中心”论，在古巴政府的大肆鼓吹下，曾在拉美风靡一时。六十年代前期在拉美一些国家中出现了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游击战，然而不久就都先后遭到了失败。这个荒诞的理论和错误路线以格瓦拉六二年在玻利维亚亲自领导的“全洲性的”“游击战”的失败和他本人的死亡而告终。血的教训对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它的流寇式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作了历史的批判。

但是也还有一些人尚未认清这个理论的错误本质。他们认为格瓦拉的失败，只是“丛林游击战”的失败，今后的“游击战”应当在城市里打，妄图以“城市游击战”使这个理论死灰复燃。六十年代后期在乌拉圭出现的“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这种新理论的产物。

“图帕马罗”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印第安人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图帕克·阿马罗的简称。他们用“图帕马罗”这个名字作号召，在城市中进行游击战。

此书内容就是反映这个“运动”的活动情况的。全书可分为五个部分：

一、关于乌拉圭社会现状的报道。

二、社会各阶层群众对“图帕马罗”的反映。

三、根据“图帕马罗”成员及当事人提供的素材而写成的关于“潘多战役”的报道。

四、通过一个被捕的“图帕马罗”领导人员的谈话，介绍“图帕马罗”的历史、组织、纲领、理论、斗争目标、手段等有关情况。

五、通过报道政府军警对“图帕马罗”成员的残酷迫害，从反面论证此一运动的“正确性”。

此书的重点是第三和第四部分。

第三部分主要宣扬了“图帕马罗”在切·格瓦拉死后周年纪念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潘多战役。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五十多个武装人员化装成出殡行列，进入距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三十公里处的潘多，突然占领了警察局、消防队、电信局和银行。当首都的警察闻讯赶来时，他们就迅速撤离了潘多。但由于“意外”事件，部分成员未能安全撤出，而陷入了警察的包围。结果牺牲三人，被捕十六人，丢掉了武器和抢来的钱。

“图帕马罗”成员把撤退时的失败仅仅归因于“意外”事件的出现。因而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失败，却又把这次战役说成是一次“在大陆上引起反响”，“对拉丁美洲具有明显意义”的“质的飞跃”。因为“主要是战斗本身，而不仅仅是战斗的胜利”。也就是说，只要行动，就是胜利，可以不顾实际效果如何。这就是所谓“游击中心”论的“武装宣传”。

第四部分，全面介绍了“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

产生的背景：社会党内部的路线斗争。

创始人的思想观点：包罗各种思想观点的大杂烩。

直接目的：反对政府，宣传政治路线，培养人材。

最终目的：实现社会主义。

纲领：“我们制订了一个小小的纲领，但不是长期的纲领，也没有从战略策略上提出响亮的口号。”而“这正是我们的运动开始时的一个伟大的优点。”

成员的来源：“我们知道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天然后备军，但……要想从中挖掘出人材来，则是一种幻想。……只有等待愿意进行斗争的人们自己找上门来。”

唤起民众：“在这方面，我们做过一些努力。”“这两年得出这么一条经验，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城市作为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是正确的。”

上述情况，可以使我们看清这个城市游击战运动的轮廓。这是些在旧的政治圈子中找不到出路的“革命者”，转而在城市里搞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武装斗争”，吸引群众参加以便推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正义感，痛恨乌拉圭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希望“改变劳动者被剥削的地位”，而且还有不畏军警的残酷镇压，开展武装斗争的勇气，但是他们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不是为谋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这个“运动”的成员的条件，不是无产

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是“意志和忠诚”。所以这个“运动”也决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从参加这个“运动”的实际成员来看，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子弟，其中有学生、职员、店员、教员和少量工人。它的真实的阶级背景，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在乌拉圭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冲击下，无法保持早先那种安闲舒适生活的中产阶级，当在政治舞台上运用传统的政治斗争工具和斗争方式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这个阶级的政治家们就铤而走险，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这个阶级中勇于冒险的人毕竟不多，因此他们就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号召，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能跟他们走。但他们脱离群众的活动方式，却使人民群众对他们不了解。在人民群众眼里，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些劫富济贫的“侠客”或善良的强盗而已。他们的冒险行动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斗争毫不相关。因此，人民群众除了对他们表示好奇和同情之外，既不理解他们，也不支持他们。他们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他们的行动却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毫不相关，如该书第一部分报道的工人罢工斗争中连他们的影子也看不到。这种情况在此书第二部分中也非常明显。自然，这并非作者的本意，然而冷酷的现实情况却与她的主观愿望根本相反。

作为“图帕马罗”产生的社会背景，作者在此书第一部分报道了十几篇社会调查性质的采访记录。采访的对象是养老金领取者、儿童教养院、监狱、精神病院、外流工人、罢工工人和小学生。这些报道除有关罢工工人的一般反映外，根本没有触及乌拉圭这个以农牧业经济为主的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乌拉圭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但却没有揭露出这些现象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建立在这些一般性社会不合理现象基础上的“革命运动”，决不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远比这些一般的社会不合理现象要深刻得多。

固然，这种“革命运动”及其武装斗争，也能起一些揭露反动统治者黑暗、腐朽的作用，给反动统治者一些冲击，但对拉美人民的革命运动，却起了干扰、破坏作用。因为它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高喊马列主义口号，冒充无产阶级革命，空谈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把革命人民引向了歧途。

现在图帕马罗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城市“游击中心”论已经破产。但此书对于我们了解拉美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城市游击中心”论这个错误的理论和路线及其背景，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素材，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拉美革命进程中出现过的和今后可能出现各种思潮。所以我们将该书译刊出来，以资参考。

该书共约十一万余字，本刊登载时在保持原书全貌的原则上略有删节。此书是我校西班牙语专业七四届学员在毕业实践中译出的，后经西班牙语教研室校改后定稿。因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一、序言	(1)
二、衰落的标志	(3)
1. 养老金 预见性还是社会堕落?	(3)
2. 儿童教养院：国家——害了虐待狂的父亲	(6)
3. 监狱：为了防止堕落	(7)
4. 埃切帕雷病区的精神病院——令人不寒而慄的地狱	(10)
5. 埃切帕雷病区：“常有人饿死……！”	(15)
三、乌拉圭，一个人口外流的国家	(20)
一个出国的乌拉圭人	(20)
四、……是的，历史将属于美洲穷苦的人们，受剥削和 受侮辱的人们。他们已决定由自己开始写自己 的历史，并永远地写下去。	(26)
1. 按照上帝的意志举行的一次罢工	(26)
2. 他们明天将长大成人	(30)
3. 你们认为图帕马罗是些什么人?	(39)
五、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47)
1. 子弹已经上膛	(47)
2. 质的飞跃	(61)
3. 采访一个图帕马罗成员	(67)
4. 拷打	(74)

图帕马罗游击队

玛丽亚·埃斯特尔·希里奥

序 言

乌拉圭日益接近拉美其它国家。这种接近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动乱以及暴力产生的。大部分的拉美人，甚至毫无思想准备的乌拉圭人都对乌拉圭的这一现象感到莫名其妙。在这个国家里出现一个游击中心，是件不寻常的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此都感到意外。这一现象更由于那些诸如把乌拉圭说成是“美洲的瑞士”、“民主的橱窗”等昔日的自由图景的比喻，而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近二十年来发生的一些急剧变化，游击中心的出现，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游击中心和军队之间的对抗所采取的殊殊形式，即战斗的性质并不那么残酷，而规模却愈来愈大这一点，仍然令人费解。为什么双方对抗具有这种特点，关键是由于那种与过去相适应的思想方式还残留着。过去，政治稳定，经济异常繁荣，从而有可能建立自由民主式的政府。

要解释上述两个现象，必须透过乌拉圭的历史进程，才能为此提出一些设想。乌拉圭人民在其领袖何塞·阿蒂加斯的领导下，为反对西班牙霸权，为实现美洲统一的计划进行了斗争。阿蒂加斯的中心思想是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他的土地制度，保护本国手工业的法律，以及维护各国人民主权坚韧不拔的意志都表明了他代表着真正独立、自主的愿望。但是，阿蒂加斯的愿望破产了，因为他的计划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而行不通。从西班牙征服时期起，乌拉圭的存在，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霸权主义的宗主国。

在当时的“土生白人国”中，一方面存在着为商人和城市阶层（他们又是居于农村各阶层之上）养肥了的贵族；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被摒弃在生产结构以外，受考迪罗①任意支配，没有人身和政治保障的群众，即高卓人。

作为农业资产阶级的贵族，是在资本主义渗入到农业中这一基础上巩固起来的。乌拉圭的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得这个“东岸共和国”②变成了“海上牛场”。本世纪初，消灭了考迪罗势力，国家获得了统一，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乌拉圭成了宗主国的原料供应者，畜牧业资产阶级从而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

①“考迪罗”（Caudillo）一词，是首领或领袖的意思。开始只是指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作战的布拉他（Plata）地区的首领而言，以后，这个名词被逐渐推广，以致应用到所有拉丁美洲各国的军事独裁者。（译注）

②即乌拉圭。（译注）

政权结构的早期民主化，是在农畜牧产品出口的资本家和面向国内市场的资本家之间达成妥协这一基础上实现的。这个妥协的目的是进行工业化而又不影响畜牧主阶级的基本利益。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建立了波拿巴特^①式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国家起再分配者的作用，并把广大的中产阶级纳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个中产阶级构成了该制度在民间的官僚阶级，成为使其稳定的支柱之一。同时，大批的移民也成为本国工业的支柱，即新生的无产阶级，补充了劳动力。牛的业务兴隆，有了钱，有了一个实力强大的消费阶级，这个阶级就给乌拉圭打上了自己的思想烙印：乌拉圭是一个没有对抗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国家。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使巴特列计划的实施成了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削弱了，随之而来的是农牧业的停滞，从而开始了一个巴特列主义赖以建立的平衡条件遭到破坏的时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另外一种工业化，这就是在对宗主国的依赖关系有所松动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工业已成为经济中富有活力的核心。由于得到朝鲜战争的好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一九五五年。但从此以后，造成这种工业化的条件削弱了。必须向外贷款购买工业设施，而农业的停滞又导致了债台高筑。在二次大战中取得了胜利的美国成了世界霸主。因偿还与日俱增的债务，而引起了通货膨胀，从而使得靠以工资为生的人们遭了殃。失业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统治阶级开始把国家作为失业保险费加以利用。他们靠朝鲜战争赚来的钱还能应付一下局面，但是，这钱也不是用不完的。仅仅缓冲一下业已开始形成的严重经济危机是不够用的，甚至是根本无济于事的。民主，作为繁荣时期的政治工具，开始失效了。但是这种假面具还是在能维持时则尽力维持下去的。乌拉圭资产阶级最大的本领就是缓和矛盾，而不愿激化矛盾。在乌拉圭，一直存在着贫困，虽然不大看得出来。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感到满意，他们有饭吃，有书读，因而他们有文化修养，他们懂得世界是在变化的。情况一开始恶化，这个阶级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人就感觉到了危机的严重程度。与此同时，劳动人民也亲身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人民准备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即政党与工会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遭到了反击，工会被封闭，报纸被禁止，会员被监禁，游行队伍遭到了枪击。法制动摇了。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法制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那只是由于得到了一次赋予政府以独裁权力的宪法改革的支撑，但这不过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而已。

这一进程并没有使人们感到震惊。乌拉圭的老牌左派曾经对危机作过正确地分析，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了解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而，他们在政治路线上也就错了。然而，却有人从同样的分析中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他们经历不同，也许他们认为应以实力和智慧来对付实力。这种实力寓于人民之中，尽管人民还不了解这一点。应该使人民了解，但是，用法律条文是做不到的，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才行。

^①即拿破仑（译注）

衰落的标志

下面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采访报导的某些片断。

养老金 预见性还是社会堕落？

爱斯基摩人到了不能渔猎的年令，就披上自己那既不值钱又不御寒的皮子，步行而去，几小时以后，倒在冰凉的地上等待死亡的来临，这种情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同情。这已是自然的现象，所有的人都在准备这一遭。在位于乌拉圭河畔的乌拉圭这一亚热带国家里，我们没有那种广阔的冻土地带让那些开始成为社会负担的人们能舒舒服服地迅速冻死，有的只是黑暗的地窖，潮湿的棚舍和破烂的茅草房。在这些地方，死亡也会来临，只是不怎么舒服罢了。

对这一事实，其余的社会成员都各自无动于衷，和爱斯基摩人相差无几。

一条破烂不堪的长长的过道尽头，有个院子，周围的灰色高墙既阴暗又潮湿。在右边一处曾作过厨房的地方，胡莉亚·梅雷纳斯搭了一间住房，里面摆着床、衣橱、缝纫机、煤油炉、画像、圣象、芥菜、药品，一只雕刻木坐钟以及一张路易斯·阿尔维托·埃雷拉穿着无袖斗篷，戴着白色领圈的照片。

“你还在干裁缝这一行吗？”

“是的，小姐。我已经干了五十五年裁缝了。请看。”

她把一个口袋凑到我的眼前，里面露出了一块块的碎布。“瞧，这是我不久前给人做十五岁生日礼服剩下的兰绸布。各种剩布，什么开士米、毛绸绒都有，我还给新娘做过结婚礼服呢。卡普鲁医生的女儿结婚时，是我给她做的嫁衣。报上的新闻有我的名字，医生还曾派人来向我祝贺。那时我的顾客很多，但是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了，又是心脏病，又是风湿病……”

“你多大岁数了？”

“七十六岁了。是的，已经不年轻了，又经常生病，要是还能干，倒也没有什么。我并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可年令不饶人，不能和过去一样干了，什么都不行了，眼力、脉搏、记忆力都不行了。有时我想：到我不能干的那一天，老天爷可别忘了带走我！……”

我向右一拐，回到过道上，半路中，顺着迎向一所古老住宅的木梯子来到了何塞·古铁雷斯的房子前，他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了。

“你为什么不去，要冻僵的。”我对他说。

“不要紧。这边走，请吧！”

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生活情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干活，干活，干活。听了他的话，就不难理解，圣经所宣扬的那句话：“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简直是

一种诅咒。“我奔波了一辈子，从六、七岁就开始在庄园驯马了。”

“你上过学吧？”

“你想到那儿去了！我十二岁就干起重活来了。一九一四我给人家送皮子，而我自己却冻得要死。”

“也热得要命。”

“是呀，可象今天这样个冷法，哪怕有一点点热气也就舒服了。”

“现在你只靠四百比索的养老金吗？”

“能过得去倒好了，怎么行呢？……我还有辆车子。”

“马拉的？”

“我就是马。”他笑了。“我这匹老马，已经不能拉车了，只有在身体好的时候还能拉几天。喘不过气来，你懂吗？”

“用车子干什么？”

“能拉的时候？”

“嗯。”

“捡烂骨头、破纸片呗。”

“捡去卖吗？”

“是的。车子倒挺好，你想看看吗？”

“好的。”

在房子几米远的地方，放着一辆双轮车。

“我要是还年轻，再加上这辆车……就是没有也可以。我不在乎什么运气的，但是现在身子骨不行了。”

“你不领养老金，干脆退休不行吗？”

“难啊。我是在庄园里长大的，东奔西颠，今天在这儿，明天上那儿。一九三〇年我在农村干过洋铁匠，有时候驯马、喂马、剪羊毛……”

“你驯过马吗？”

“嗯……有时我也喝点。”①

“我说是驯马。”

“噢，驯马，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子，也许认为……，我现在象散了架子一样，有两次差点死了。”他又用某种骄傲的口气说：“我在一九五八年还领取过十字互助金②呢。”

“啊！十字互助金？”

“是的，太太，我以前有肺病，不过只领了三个月的互助金。后来，病好了，互助金也就发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家。现在我又病得很厉害，我等着发给养老金到医

①在西班牙语中驯马domar和喝酒的喝字tomar发音差不多。

②防癆十字互助金：是一种社会互助组织，入会者每月付一定会费，用来资助不能工作的肺结核患者。（译注）

所看看能不能使用供气疗法。”

“供气疗法？”

“是的。还有治支气管炎的药丸。”

“现在情况怎样？”

“现在还不至于挨饿。不过我越来越害怕，怕不能再干活了。靠四百比索……我要是年轻的活，那就是另一回事，我就无所谓了”

在安西纳大街的一间门朝街的风子里，一个一开口就笑的黑发妇女对我说：她是领取养老金的，并准备回答我向她提的问题。一个放在地上的煤油炉当作烤火的炉子，一块棉布帘子将房间隔成厨房和卧室两部分。她掸了掸椅子，叫我坐下，她自己也显然是高兴地坐了下来。

“请提问题了！”

“多大了？”

“足岁七十五。”

“有工作吗？”

“托老天爷的福。”

“工作多久了？”

“九岁就开始干活了。”

“你有点巴西口音。”

“我是塞罗·拉哥人。”①

“年纪这么小能干什么呀？”

“能做好多事呢！当佣人，拾掇房间。十六岁我就会做饭了，当时工资是五个比索，这是很高的工资了。因为主人是我的教母，后来她死了……那是在二十年代。以后她的家破落了，我赚的钱也就少了，只有四个比索了。”

“你一直是干这种活吗？”

“是的，一直是洗衣服、熨衣服、做饭。我很喜欢做饭，就是不识字……要是我识字多好啊！我可以看了菜谱以后再做饭。对我来说，没有比做饭再好的了。”

“看上去你是个好厨师。”

“要不是上了年纪，我就不会老是呆在这儿，我可以走东闯西，上别的厨房干活。我多次梦见我是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当厨师，拔鸡毛都拔累了。”

“还戴着白帽子？”

“什么？”

“你梦见戴着厨师领班们戴的那种白帽子吗？”

“倒还没有注意过……相信吗？”

“你从塞罗·拉哥来这里多久了？”

“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大概在三十年代吧，我在蒙德维的亚的一个旅馆里洗衣

①塞罗·拉哥是乌拉圭十九个省中的一个。

服，每月工资四个比索。就这四个比索，我得拿着篮子跑东跑西。那时不象现在拿记件工资，我老端着泡着衣服的既粗又笨的大盆。医生说我是因此而得了讨厌的肺病的。下雨天衣服干不了，就叫我把衣服熨干。有一天，因连下一个星期的雨，衣服没有干，老板就大喊大叫，要我把衣服都熨干，我就抓起篮子把它扔到街上，对他说：你另找人吧，我不再为这四个比索卖命了。但是还得干啊！对吗？跟你说，还是要卖命啊！”

“那时候用电吗？”

“什么电不电的，用煤，孩子呀，那时候熨斗是用煤烧的。”

“那么，你现在还干活吗？”

“光靠养老金是不行的，你看，我拿四百比索，到了晚上就都用完了。房租一百另五比索，电费六十比索，二百来个比索用来买东西……嘿，我都快气疯了。我把养老金拿回来，一数，连塞牙缝都不够，怎么能不干活呢？只要身体还行就得干，等身体不行了，那就……。”

我进行了六次采访，我所采访的人都是在六十五至八十岁之间，受着疾病折磨的老人。从采访对象的年令来说，生病不足为奇，但他们这些人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劳动了，这却是我一个新发现。而且到现在仍然还在劳动，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害怕失去工作能力。

我认为只要把这种简单的调查再搞得广泛些，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优胜劣败的规律也在起作用，而弱者用不了多久就会中途死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

儿童教养院①：国家——害了虐待狂的父亲

三十年前，儿童法的起草者们写道：“国家是被遗弃的孤儿们理所当然的保护者。然而不幸的是，在世界各国发生的事情却证明：国家是一个坏父亲。”一部掺杂着慈爱，时代错误以及浪漫主义模糊观点的儿童法的热情制定者们，未曾想过“坏”这个字眼，居然会加在作为父亲的国家这个真正概念之上。然而今天，任何一个稍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国家称做虐待狂。

我的采访是从“贝罗博士”地区开始的。这是一片布满了树木和倒塌了房屋的二百二十公顷的土地。杂草丛生的道路在那些牢固而又凄凉的老式建筑物中间蜿蜒盘旋。建筑物的窗户上全无玻璃，房子靠一些弯弯曲曲生了锈的钢筋支撑着，这象是一座被轰炸过的城市。偶尔有几个衣衫破烂，眼神好奇而又疑惧的幸存者走过。我问有没有菜园子。“菜园子？没有。拖拉机坏了。拖拉机好的时候没有油，有了油又没有种子。这就要打个报告，可是当报告送去，种子到来的时候，种植季节已经过去了。因此本来自己能生产的东西（因为有土地和劳动力）只好去买了。鸡棚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全都废弃在一边。我们在苏阿雷斯这个地区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过一个鸡蛋了。如果有一天再养

①国家负责执行儿童保护法的机构，也对青年罪犯进行教养。

鸡的话，就得重起炉灶，因为鸡棚愈来愈破旧了。”

我向几个在墙根前避风处作“抓石子”游戏的孩子走去，这是五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我问他们识不识字，他们都羞羞答答地说识字，同时他们又相互指责，说对方在说慌。“我认得字，只是不会写。”“我识字，他不识。”“他们都在说慌，这里只有我识字。”我用一根小棍子在地上写了几个字让他们念。有两个孩子结结巴巴总算念出来了；另三个孩子只认出几个字母来。我后来跟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谈了这件事。“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把孩子们送到这里让他们住下来，就万事大吉了，谁也不去管他们。进来时都过了十四岁了，但都一个大字不识。”

然而，儿童教养院的院长却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有着编制完整的教学人员。贝罗地区（即苏阿雷斯地区）的教员增加了一倍。”

话倒是真的，但也不完全对。首先应该说，这个居民区，智力上没有得到最低限度发展的儿童占有很高的比例。所以这不光是派教员的问题。另外，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贝罗地区有十一个教员，而其他地区或教养院却一个也没有呢？比如象：塞罗·拉哥，阿森西奥·梅塞德斯，进步土地之家等地区就是这样。贝罗地区既然已经有了六个教员，为什么又派了五个呢？（三个临时的，两个直接任命的。）因为在这个地区任教是个肥缺，教员的收入比其他地区多百分之二十。这些教员追求什么目的我们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一九六六年七月

监狱：为了防止堕落

在囚犯走动的院子里，一块大牌子上抄录着我们宪法的第三十条：“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把监狱用来虐待，而是用来保护被告和犯人，对他们进行教养，培养他们的劳动能力和防止重新犯罪。

在这块牌子下，几个接受这种法定教养的活物在走动，有两个是穿着破衣服的无业流氓。

“这些人也是犯人吗？”

“是的，因为囚衣不够。”

“没有缝纫车间吗？”

“你来看吧。”

这是一间二十五米长，六、七米宽的房子，锌皮屋顶开了不少窟窿。一个囚犯在一个角落里踏缝纫机，其余的缝纫机根据房顶上的窟窿排列着。一个小灯泡照在干活的囚犯身上，而站在那里边聊天边搓手的四、五个囚犯则处于半明半暗之中，室外温度是五度，我看这里也不会超过六度。尽管我穿着靴子，毛线衣，粗呢外套，但是还感觉很冷。而他们大多数人穿着破麻鞋，破烂方格衣服，显然他们比我还冷。

“这台机器值五十多万比索，是一台缝扣孔机。因为缺少一个零件，已经有五年没有用它了。”

“衣服怎么缝扣孔呢？”

“衣服？发衣服的时候才有得穿，我们已经有五、六年没有看见内衣了。有的囚犯穿着本白色无袖斗蓬到院子里来，看守就喊：‘为什么穿着无袖斗蓬出来？’要是我有一件斗蓬就好了。从前还发给犯人鞋子，现在只发麻鞋。小姐，因为从前有制鞋车间，现在没有了。现在是饥寒交迫，既不发衣服，也不让穿着自己的衣服到院子里来。只有在牢房里才可以穿，到院子里是不准穿的。你会说：‘我是没有穿的了！裤子洗了，上衣洗了！’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们来到制鞋车间，到处都是蜘蛛网，机器在那儿已沉睡了好多年了。三个囚犯在铁架堆里，搓着手，冻得来回走动。

“这个车间完全报废了。”

“是的，要是再开工，就要化费一大笔钱。”

“几年没有制鞋了？”

“四年了，开始时是因为没有鞋底……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是搞预算的。”

“现在已经不做鞋子了，你们还到车间来吗？”

“可不，我们照常来应卯，有时院子里有太阳，我们就出去晒会儿太阳。”

一个还要关七年的囚犯对我说：“我要有活干就不想上街了。听说检查团要给我们解决工作问题。如果再给我们活干的话，我就满足了。囚犯整天关在牢里不干活，日子才难过呢！书上都是这么讲的，谁都懂得这一点，这叫……。”

“劳动疗法？”

“对，叫劳动疗法，犯人用劳动来治疗他们的疮伤。”

× × × × ×

我们穿过大院子，在半明半暗的黄昏中，我看到一个囚犯从装有铁栏杆的高窗上观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估计他是在等我们在下面走过的时候就喊我。当他发出喊声时，我们已经到了门口。“小姐，小姐，看在你妈妈的面上听我讲，别害怕，听我讲，救救我吧！”

“他是个精神病人。”我的向导对我说。

“精神病人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 × × × ×

Y.Y.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个五十多岁、体胖、神态安祥的人，一直在教养所和感化院领取养老金。他的大部分成年时期是在教养所和感化院里度过的。大都是由于盗窃的原因。他手里拿着一杯杜松子酒，慢慢地喝着，边说边笑。

“你别耽心我的时间，直到八点，我什么事也没有。”

“你八点才开始干活？”

“太太，哈哈，我从来没有干过活……你想想看，我现在还会去干活吗？……”
八点，我就到港口上去绕一圈。”

“去搞走私吗？”

“不，不……我去联系。”

“联系？……”

“对，去和给我带来生意的人联系。……都是些干这一行的小伙子。好多年了，你想想吧，……我认识所有的人……他们都知道和我是最好打交道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守信用的……但是，你知道吗？关于监狱，我了解的是以前的情况，那是个黄金时代，有吃的，住的也宽敞，也平静无事……。现在呢？一个牢房里住四、五个人，牢房里只有两张床，……三个人睡在地板上，以往还搞点木板，现在连木板也没有了。囚犯是有点破坏性的，瞧，他们把地板砸下来，烧掉了。有的人没有钱买煤油烧水，就在牢房里随使用什么东西烧火。你想象不出一九三七年的情景，那时连放衣服的柜子都有，床有两张，什么都齐全，挺舒服。我也说不出后来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一切都慢慢变糟了。后来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教养所，一切都逐渐垮下来了，越来越不行了。几年前他们挨个地叫过犯人来问：你需要什么？缺少什么？想亲人探监吗？需要探监吗？那时每月规定探监八次。这样，囚犯不用请求什么，不用等待他们回答可以不可以，也就安静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关于这个问题，你写的文章曾谈到这一点。”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你一直看‘前进’周报①吗？”

“不，太太，我只是在报亭里看过，但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期‘前进’周报我看了，因为我知道我谈的一些情况会见报。……可有一个问题，在文章中谈到了那些疯子……说连疯子也被关进来……”

“怎么？你认为没有疯子？”

“有，但问题并不光是把疯子关进来，加以虐杀，更糟的是人们在这里都被关疯了。我认识在窗口喊你，向你求救的那个人，他叫T.T，不是在第二层靠门的窗口那儿喊你的吗？”

“是呀。”

“唉，这小伙子完了。”

“怎么完了。”

“他还不是个活尸？”

“怎么？”

“就是个活尸，他被葬送了。听我讲，你想想，进来的这些造反的，打架的所谓危险分子都属于胡闹一类的犯人。不把他们关进普通犯监狱，也不让医生、心理学家或其他什么人给他们治疗，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狱长发明的监狱里，这是只有恶鬼和坏蛋才能

①乌拉圭左派办的周报，社长卡洛斯·基哈诺。作者在该报上发表了本书中的大部分材料。

发明出来的牢房。当你进牢房时，神经有点不正常，关了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后再出来，就变成十足的一个疯子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请你谈谈牢房是什么样子的，谈清楚点儿”。

“全是水泥做成的，床、墙、桌子全是水泥做的。窗上有铁栏杆，外面还罩上一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

“囚犯每天在那里呆多长时间？”

“二十三个小时，你听到了吗？二十三个小时，而每天只放风一小时。”

“他们和谁讲话呢？”

“不能跟任何人讲话，谁也不能跟他们讲话。如果你与一个这种囚犯讲话、递香烟或其他东西，那就要受到惩罚，关十五天禁闭。有一个时期，这些囚犯在牢房里劳动，他们做的是铁丝刷具，每一千公尺可以赚四十比索左右。但是不到一年前，这种劳动就被禁止了，因为他们使用的是钳子和电线……监狱当局害怕了。”

“害怕什么？”

“说是怕他们自杀。”

一九六七年五月

埃切帕雷病区的精神病院——令人不寒而慄的地狱

黄昏时分，我来到了埃切帕雷病区①。在稀稀拉拉排列着的病房里，涂着油漆的玻璃窗里射出灯光来。要不是那兰色的灯光和在病房中间走动的人影，我还以为我是在一个荒芜的村庄里呢！许多窗子没有玻璃，只好钉上木条，这样使窗户开不能开，关又关不成。掉了石灰的墙壁露出了砖头，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里面是乌漆墨黑的，这准是多年没有打扫了。除病人外，老鼠在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还有几只狗，病人和它们和睦相处。

我首先来到了杆菌隔离病房，外间亮着一盏四十支光的电灯，照着靠门的房间。房间里有几堆人，每堆有二十到三十个病人，有人坐在木箱或凳子上，有人蹲着。他们穿着条格衣服，用破布包着头御寒，脚上的麻鞋和破鞋几乎遮不住脚。他们正在用罐头合烧水，有的煮着带油脂味的灰色糊糊。如果我们在剧场里看戏，幕布突然拉开，那么就会想象到：这活象是一群乞丐呆在一间无人居住的风子里。我走进宿舍，好多病人已经躺下了，大部分都盖着头，我摸摸床，两条毯子，最多的也只三条，很薄，都是用棉花织的。室内的温度比室外高两度，是十一度。我向护士指出：这里缺少盖的。

“哎！你还没看到呢，这是最好的病房了。窗户上还有玻璃呢！”

× × × ×

我离开这病房向另一个病房走去，天已经黑了，我看到陪同我的人弯下腰正在找什么东西。

①专属卫生部。是一处疯人收容所。

“你干什么呀？”

“找一根棍子。”

“干什么？”

“打狗。三天前一个病人差点给咬死了，昨天又咬伤了一个，伤很重。”

我也弯下腰找棍子。

我们走了二百到三百米的样子来到第二病区，这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死水气味。

“这是怎么回事？”

“阴沟堵了，水管破了，卫生条件差透了。”

走上通向房间的楼梯时，我发现水从里向外流到各处，流到盥洗室、宿舍。我心想：能有几个所谓健康的人，在这儿睡上一夜，而不精神失常啊！

“我们不得不将这些病人从宿舍里弄出来安排在这里。这儿原是食堂。”看守对我说。

“那间原来是宿舍吗？怎么连门也没有？……这不等于睡在露天了吗？”

“是呀，现在检查团要来了，就会给装上门的。”

我朝一排人看去，他们都剃光了头，靠在没有套子的红布枕头上，六十五个病人只有五条床单。他们很安静，好象对到处泛滥的死水味道毫不在乎。一个病人叫住我，含糊不清地对我讲了半天。他说：他从头一直痛到背。我穿的白外套使他以为我是个医生，我没有使他失望，假装给他搭脉，并担保他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好起来。其他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我刚讲完，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说这儿痛那儿痛，并伸出手来，也要我给他们搭脉。我问看守，对那些晚上生了病，或者是吵得厉害的人有什么办法？

“除了重病外，由我们自己治疗。”

“你是护士吗？”

“不，我是看守。”

“看守怎么会……？”

“……靠实践。实际上这儿所有的看守都能干护士这一行。”

我走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病人正在逗弄一只被水围住的猫。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立刻象弹簧样地站了起来。

“医生，给我一个比索买茶喝吧？”

× × × ×

我们拿起棍子，在夜晚的黑暗中走着，来到另一间病房。这里同样缺少被子、毯子，也是那样微弱的灯光和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墙壁。但宿舍却扫得干干净净，也比较整齐。我问谁是负责人，人们向一个病人指了指。显然他是一个同性恋爱患者。我一下子想到在一百多个病人中，有一个同性恋爱病人存在，而他的毛病又是性的问题，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看守耸耸肩说：

“我们根本不管这些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发现许多窗户上没有玻璃。

“这样他们不冻死了吗？”

“可不，冷得够呛。自从五九年因检查团来装过一次玻璃后，就没再装过。那时装了两千块，听说这次检查团来之前，又要全部装上。”

“什么？谁来？”

“又要来一个检查团。”

“看得出你们在作准备了。”

“这几天什么都有了，毯子……药……甚至连医生都有了。”

“嘿，医生吗，难得来次把，三十个医生只有两个住在本区。住在蒙得维的亚的医生，要他们能够有求必应地来到这里是并不容易的，如果来也是匆匆忙忙的，来回要五小时，又是火车，又是汽车，而且他们又不是光干这一种工作，难啊！”

“工资高一点，干全日制兴许能好一点儿吧？”

“也许会好点儿。”

我们出来了。

“你今天真的还想睡觉呢？”

“你问这个干么？”

“我们对面是九号病房，是这个区的病房中最差的一个。”

“还有更差的吗？”

“有，那间病房里大部分是特殊病人，房门关的紧紧的。”

“病房”这个时髦的字眼用在这些阴森森的铅皮房子上是多么不合适呀。门口用铁丝网挡着，木门打开，铁丝网也总是关着。我把手伸向门闩，立即有五只意图不明的手臂通过铁丝网向我伸来，我急忙后退一步，但是我又马上站住了。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学到了些东西，在同病人接触的时候，要沉着，稳重，坚定，不要害怕。我若无其事地向他们打了个招呼，等着看守开门。第一个房间原来是作食堂的，有一处地板已经坏得露出了泥土。在一个角落里，十个到十五个病人拥挤在炉子旁，在我看到的所有精神病人的脸部中，他们的脸部是最符合我们外行人对神经病人的想象了。他们眼睛无神，动作错乱。这里尽管有炉子，但还是比其他房子冷；铁皮屋顶全是破洞，把本不能御寒。

“下起雨来怎么办？”

“病人就躲在床上。”

“如果下几天雨呢？”

“那就天天在床上躺着。”

“都是些特殊病人吗？”

“大部分是。”

“西沙曼试验是阳性吗？”

“只有一个不是，就是同瘦子一起喝茶的那个人。”

“怎么？难道不会有再受传染的危险吗？”

“不会。瘦子没有梅毒，他是偶然到这儿呆几天的。”

“但是危险照样是有的。不是受这个传染，就是受那个传染。”